

REGENT
REVIEW OF CHRISTIAN
THOUGHTS

基督教思想评论

许志伟 主编

总第十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REGENT
REVIEW OF CHRISTIAN
THOUGHTS

基督教思想评论

许志伟 主编

总第十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思想评论.第10辑/许志伟主编.—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9
ISBN 978-7-208-09018-7

I. 基… II. 许… III. 基督教-思想评论-文集 IV.
B9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5764号

责任编辑 陈雯雯
封面设计 储平



世纪文景

基督教思想评论(第十辑)

许志伟 主编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毫米 1/16
印 张 21.25
插 页 2
字 数 304,000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9018-7/B·788
定 价 39.00元

主题编者语

在“基督教与西方文学”的大主题之下,这六篇主题论文从不同视角剖析了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内在关系及外在表现,主要从文学批评、文本分析、神学精神与文学创作的融合等角度对基督教与西方文学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对从多方位诠释文学作品、拓展文学研究广度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基于宗教信仰之上的文学创作与文化”(万德化)一文,从诺斯洛普·弗莱与《圣经》始源、肯尼思·伯克与宗教修辞、文学经典的阐释——哈罗德·布鲁姆以及乔治·斯坦纳与语言的宗教性四个视角透视了宗教信仰、文学创作及西方文化的渊源关系,是研究西方文学批评的一篇颇具价值的文章。“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基督教视角”(杨彩霞)则通过对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与基督教文化关联性的分析,着重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同构关系,可以视为与“基于宗教信仰之上的文学创作与文化”所作的对照性文学批评研究。“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基督复活主题”(梁坤)的主要视角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神圣使命——重寻上帝、复活耶稣基督的本原精神,耶稣基督因而成为诸多文学创作的主人公。作者认为,如此多样而强烈的基督学倾向似乎是从文化内部克服19世纪以来俄罗斯宗教危机的一种表现。“从‘圣杯’看文学与基督教的互释关系”(代丽丹)亦可视为阐释文学与基督教内在关系的颇具价值的分析。“文学,抑或教义?”(张华)以路易斯《纳尼亚传奇》为例进行个案分析,表明当代西方文学创作中运用新的“有意味的形式”传达基督教内在的文化意涵,以更大的、可能被接受的方式实现文学与教义的完美融合。“晚年柯勒律治的诗与思”(李枫)则以晚年柯勒律治作为个案进行分析,作者认为,晚年柯勒律治将注意力更多地由诗学转向神学,以诗意的探寻与神学思考,逐渐向世人展示了其从“魔幻派”浪漫主义诗人到浪漫主义神学家的转变,是研究文学与教义融合的有

益视角。

正像文学作品蕴含有多种阐释的可能性一样，这六篇主题论文的筛选正是出于百家争鸣的考虑。主题编者期冀通过这几篇文章，引发更多对西方文学与基督教的相关讨论，以此来丰富神学、文学、宗教的论坛。

杨彩霞

目 录

主题论文——基督教与西方文学

- | | | |
|----|------------------------------------|-----|
| 1 | 基于宗教信仰之上的文学创作与文化 | 万德化 |
| 14 |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基督教视角 | 杨彩霞 |
| 23 |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基督复活主题 | 梁 坤 |
| 32 | 从“圣杯”看文学与基督教的互释关系 | 代丽丹 |
| 42 | 文学,抑或教义?
——以 C. S. 路易斯《纳尼亚传奇》为例 | 张 华 |
| 54 | 晚年柯勒律治的诗与思 | 李 枫 |
| 68 | “最伟大的牛津人”——C. S. 路易斯 | 汪咏梅 |
| 85 | 自由与爱: 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解读 | 邵铁峰 |

神学研究

- | | | |
|-----|---|-----|
| 100 | 论屈梭多模的治疗性神学 | 石敏敏 |
| 108 | 论战中的“火花”
——教父爱任纽对基督信仰的理解 | 赖敬兴 |
| 129 | 在“被怜悯者”与“被刚硬者”的背后
——试析阿明尼乌对《罗马书》第 9 章的解读 | 董江阳 |
| 137 | 生态神学中的社会观 | 曹 静 |
| 150 | 试论莱茵霍尔德·尼布尔的宗教认识论特征 | 唐 瀚 |
| 162 | 论布鲁斯及其《圣经正典》的思想 | 刘友古 |
| 172 |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宗教
——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宗教思想解析 | 肖 朗 |
| 179 | 真是什么?
——试析托马斯·阿奎那对“真”的定义 | 郝松波 |

- 190 不虔的希律,你为何畏惧
——1517—1520年马丁·路德的礼仪观念 肖 超
- 203 西季威克论道德与宗教的关系 陈江进

宗教比较研究与对话

- 217 交织在历史中的中西异质文化碰撞
——自唐至明清之际基督教精神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孙 翀
- 232 中文世界处境中的“因信称义” 祝 帅
- 242 决疑论和经权说比较研究 黄 佳
- 265 新旧“对话十诫”比较
——斯维德勒对话思想初探 梁 骏 祝 烨

历史与现状

- 274 存在非此即彼的历史评判吗?
——一桩有关光若翰的历史公案 刘国鹏
- 291 “承认的政治”与信仰生活
——以一个民工基督教会为个案 黄剑波
- 299 日本接受基督教的特色
——以无教会运动和民艺运动为中心 神田健次
- 310 多元社会里中国基督教的多样性
——以一与多为框架探讨当代中国基督教的活力与张力 王美秀

书评

- 321 世俗的耶稣和神圣的耶稣
——评《耶稣:揭示一位宗教革命者的生活、教义和相关性》 马文辉
- 325 宗教与文学研究的图式
——读法雷特《建构一种基督教文学理论》 宋传民
- 331 《基督教思想评论》稿约

CONTENTS

Theme Papers: Christianity and Western Literature

- | | | |
|----|--|---------------|
| 1 | Literary Creation and Culture Based on Religious Belief | K. Wardega |
| 14 |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ture: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 Yang Cai-xia |
| 23 | The Resurrection of Christ in the 20th 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 Liang Kun |
| 32 | The Correlation of Literature and Christianity from a View
on Grail | Dai Li-dan |
| 42 | Literature, or Teaching? A Case Study of <i>The Chronicles</i>
of Narnia of C. S. Lewis | Zhang Hua |
| 54 | Coleridge's Poems and Thought in His Later Years | Li Feng |
| 68 | The Greatest Oxfordian: C. S. Lewis | Wang Yong-mei |
| 85 | Freedom and Lov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Brothers
Karamazov | Shao Tie-feng |

Theological Studies

- | | | |
|-----|--|-----------------|
| 100 | On the Therapeutic Theology of Chrysostom | Xi Min-min |
| 108 | Understanding of Early Church Father St. Irenaeus of
Lyon About Christian Faith | Lai Jing-xing |
| 129 | An Analysis of Arminius' Commentary on Romans IX | Dong Jiang-yang |
| 137 | Social Outlook in Ecological Theology | Cao Jing |
| 150 | On Reinhold Niebuhr's Religious Epistemology | Tang Han |
| 162 | On Frederick Fyvie Bruce and His Thoughts in <i>The Canon</i>
of Scripture | Liu You-gu |
| 172 | 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Wittgenstein's <i>Vermischte</i>
<i>Bemerkungen</i> | Xiao Lang |
| 179 | What is the Truth? — An Analysis of Thomas Aquinas's
Definition of the Truth | Yan Song-po |
| 190 | Martin Luther's Liturgical Theology from 1517 to 1520 | Xiao Chao |

- 203 Henry Sidgwick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Morality and Religion Chen Jiang-jin

Religious Comparison and Dialogue

- 217 The Influence of the Christian Culture o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ng Dynasty to Ming and Qing Dynasty Sun Chong
- 232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n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Chinese Context Zhu Shuai
- 242 Comparative Study of Casuistry and "Jing-Quan" Huang Jia
- 265 The Comparison of the New and Old Principles
for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Liang Jun Zhu Hua

Yesterday and Today

- 274 Does an Either-or Historical Judgement Exist? A Historical
Controversy about De Guébriant Liu Guo-peng
- 291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and Religious Life: A Case Study
on a Migrant Church in China Huang Jinbo
- 299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in Japan Dr. Kenji Kanda
- 310 The Diversity of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in a Pluralistic
Chinese Society Wang Mei-xiu

Book Reviews

- 321 Jesus in the Secular and Religious Sense: On Jesus:
*Uncovering the Life, Teaching, and Relevance of a
Religious Revolutionary* Ma Wen-hui
- 325 A Schema of the Contemporary Study of Theology and
Literature: On Towards a Christian Literary
Theory Song Chuan-min

基于宗教信仰之上的文学创作与文化

万德化* 著

杨彩霞** 译

本文力图表明,说英语的研究人员最近所作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如何引导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文本的职责以及作者和读者在生产 and 消费小说、诗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文首先讨论四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创建者的研究状况。然后,依据乔治·斯坦纳和卡尔·拉纳的著述,提供一种本体论的解释,从而阐明优秀的文学文本如何在人类及其所在的社会中施行及发挥重要作用。

在北美地区(美国和加拿大)各种文学批评的研究中,其中一个方向关注的是文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

1. 加拿大人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是一位基督教牧师,他在北美掀起了第一股文学理论研究的潮流,同时力图表明《圣经》是所有文学技能和文学进程的某种始源。

2. 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是一位不可知论者,他认为每种符号系统都有可能从属于基督教神学的主要前提。尽管伯克着重于宗教修辞的研究,但他根本不预设上帝的存在。^[1]

3.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总体而言,布鲁姆遵循伯克的批评,其注意力在于犹太神学范式领域的文学范畴。

4. 对于乔治·斯坦纳(Francis George Steiner)^[2]而言,文学批评与创造这一事实存在关联。他认为没有纳入到神学事件中考虑的文学不具有生命力(缺乏繁衍力),而且没有价值。

* 作者简介:澳门利氏学社社长。E-mail: wardega@riccimac.org.

** 译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E-mail: yangcx@ruc.edu.cn.

[1] Kenneth Burke, *The Rhetoric of Relig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1970, p. 2.

[2] 弗朗西斯·乔治·斯坦纳(Francis George Steiner),生于1929年4月23日,是颇具影响力的欧裔美国文学批评家、随笔作家、哲学家、小说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他有大量著述探讨语言、文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大屠杀的影响。通晓数种语言,极为博学。人们通常把重新界定批评家的作用归功于他。

以上,我提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四位重要批评家,目的是考察宗教文本作为一种特殊方式和享有特权的工具的言语系统,从而理解文学语言,尤其是其与各种宗教类型学之间的关系。

要理解这一点并不要求任何信仰行为。换言之,批评家并无必要分享但丁的信仰才可以解释文学语言的宗教维度。

在这一方面,我们可能有兴趣从詹姆斯·乔伊斯那儿撷取例子。虽然乔伊斯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但为了自身之目的,他还是使用了修辞对其一些伟大的文学创作进行阐释。^{〔3〕}

下面,我们将探讨这四位伟大的批评家会对我们说些什么。但是,这四种文学声音并不建立任何文学理论的同质教义。事实上,他们在文学这一话题及其与宗教语言的关系上表现出众多的一致和不同。

1. 对于弗莱而言,《圣经》包含了所有西方文学类型的原型。

2. 对于伯克而言,宗教修辞构成了探究生活和文学之间关联的任何研究的某种范式。

3. 布鲁姆认为他研究文学的方法表明一种非神圣化叙述之上的诺斯替式想像。

4. 乔治·斯坦纳所持的观点是,真正的文学语言预设——如果不是上帝的存在的话——至少是对宗教信仰或某种神学背景的一种假定。

一、诺斯洛普·弗莱和《圣经》的始源

弗莱(1912—1991)在其第一部著述《可怕的对称:威廉·布莱克之研究》(*Fearful Symmetry: A Study of William Blake*, 1947)及其后来的经典之作《双重想像》(*The Double Vision*, 1991)中提出,基督教的《圣经》是所有象征、神话、体裁和西方文学类型学的范式。

在其后期的一次采访中,弗莱明确提出他在第一部著作《可怕的对称》中已经谈到的思想:《圣经》教导人们自由地想像和创造他们所渴望的任何东西;在最后阶段,想像力和创造力成为人身上的神性。事实上,基督教

〔3〕 乔伊斯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喜爱但丁,几乎就像《圣经》一样。”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lmann)在《乔伊斯传》(*James Joy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中提到这封信。埃尔曼在他的传记中写道,尽管乔伊斯失去了天主教信仰,但他对天主教神学的兴趣不减。天主教神学被认为是他文学创作灵感的来源。

《圣经》把人身上的神性与其内在的人性结合起来。这样,基督教就在人的面前洞开了自由(一种内在的解放)之门,这是一种应对人类生活及其周围生活的无限方式。^{〔4〕}

四十年间,弗莱一直致力于把各种原型、形态和象征进行分类,这使得他能够在不同类型的文学文本之间确立联系。在他一贯的著述中,弗莱如同最近朱莉娅·克里斯蒂娃那样,表明文学与宗教紧密相连。^{〔5〕}

任何可敬的文化中都富有基本的神话,《圣经》代表着西方文明最终且确定无疑的神话!

对于弗莱而言,创造、堕落、毁灭、流逐、救赎和恢复是文学的本质模式,这些内容在《圣经》中都可以找到。

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批评的解剖》(*The Anatomy of Criticism*)一书中,弗莱构建了一幅文学的总体想像。^{〔6〕}为了对其理论进行概括,弗莱转向了二分法,这是受到布莱克的诗《双重想像》^{〔7〕}中一节的启发。

弗莱告诉我们的是,文学虚构的每个措词都带有自然的方面(自然的想像)和精神的方面(精神的想像);而且,充满文学经典之组织的主要成分是神话(故事或叙事)和暗喻(或比喻性语言)。^{〔8〕}暗喻使双重想像成为可能,它也是一种允许任何宗教启示的方式,因为《上帝通过一种语言事件向我们显现》^{〔9〕}。但是,有些理论家并不赞同上述援引的动机。^{〔10〕}

不管怎么说,弗莱只是希望自己的研究成为文学精神和神学精神的交汇点。在他生命的晚期,他曾说过,坦白地讲,从世俗的视角解读他的理论是远远不够的。

弗莱对文学的研究,始于他对人的物质必要性的考察,这一物质必要

〔4〕 In David Cayley (Ed.), *Entretiens avec Northrop Frye*, Saint-Laurent (Québec), 1996.

〔5〕 克里斯蒂娃认可弗莱关于宗教在文学研究中所处核心地位的观点,但在某些方面,她与弗莱有着不同的看法。在她看来,把想像与宗教关联在一起的是无意识,不是原型,也不是象征。参见 Julia Kristeva, "The importance of Frye", in Lee Alvin A. and Robert D. Dham (Eds.), *The Legacy of Northrop Fry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4, pp. 335-337. 另建议参阅克里斯蒂娃最近关于大圣兰的著述 *Thérèse mon amour*, Paris: Fayard, 2008, p. 750.

〔6〕 Northrop Frye, *The Anatomy of Critic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11.

〔7〕 N. Frye, *The Double Vis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91, p. 16 and p. 78.

〔8〕 Id. *The Double Vision*, op. cit., p. 17.

〔9〕 参见 N. Frye, *la Bible et la littérature*, 2. *La Parole souveraine*, Paris, Le Seuil, 1994, 和 *The Double Vision*, op. cit., p. 6.

〔10〕 比如说,茨韦塔·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在论述弗莱的观点时,并没有考虑宗教的因素。毕竟,他将把加拿大批评家抛在一边从而构建自己的文学理论。参见他的 *Introduction à la littérature fantastique*, Paris, Le Seul, 1970.

性导向人对精神的需求。(我们可以在他以下的作品中考察他的研究:《伟大的代码》(*The Great Code*, 1983)、《神力的语言》(*Words with Power*, 1990)和《双重想像》(1991))

在研究的最后部分,弗莱认为人类为两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所纠缠,他称之为初级观念和次级观念。所谓“初级”观念,指和营养、性爱、财产以及活动的自由相关,而“次级”观念则和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活动有联系。^[11]

弗莱认为,基本的神话伴有极度痛苦(焦虑)感,这跟“初级”观念有关。但是,这些初级观念极有可能使自身成为一种内在的价值,并通过暗喻的手段表达自身,正像人们生活中精神需求的某种满足。

根据弗莱的观点,次级需求从属于初级需求会产生痛苦的威胁。但是,初级需求和次级需求之间的和谐却可以使人走向救赎之善。

在《批评的解剖》中,弗莱断言,文学建立在悲剧(其中个体从社会中撤出)和喜剧(其中个体又融入社会)这两个基本模式之上。^[12]文学表述可以在“自然的、幸福的、理想的世界(喜剧)与可怕的、悲惨的世界(悲剧)之间作出选择”^[13]。

从《圣经》的视角来看,悲剧具有讽刺意义,因为《圣经》中找不到最终不可转变成有益的解决方案、完全悲剧性的故事(场面)。在那儿,一种表面上看似的不幸可以在一个不确定的将来成为幸运之事。^[14]

在弗莱看来,《圣经》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最高级神话,因为它包含了人类所有的初级和次级观念,而且它还承载了世界之悲惨的最后解决方法及其最终的精神救赎这一使命。

二、肯尼思·伯克与宗教修辞

肯尼思·伯克(1897—1993)花了一生中的60年时间研究生活与文学的关系。跟当时美国文学的研究趋向相反,伯克从一开始就打算研究被认为是人类生活观念结果的文学现象。

[11] N. Frye, *la Parole souveraine*, op. cit., p. 62 sq.

[12] N. Frye, *la Parole souveraine*, op. cit.

[13] Id., *le Grand Code. La Bible et la littérature*, Paris, Le Seuil, 1984.

[14] 参见 *Chinese Moral Tales*, 中国寓言,“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根据弗莱的研究,伯克可以这样说:人的初级需求与文学作品的象征相关。伯克把象征定义为“存在模式的言语对等”^[15]。在他看来,象征是一种把言语与体验关联在一起的方式,但言语并不类同于体验。诚然,“象征带走了躲在其后的经验的实质”^[16]。

这就是象征为何尤为费解的缘故。然而,这种费解使我们可以把文学视为一种象征性的层面,这一看法有助于我们对自己生活遭遇的困难作出反应。象征是向我们发来的一种邀请,邀我们对它作出解释。在伯克的理论中,其存在(象征的存在)有助于使作者和读者关注的事更为清晰,并决定之。

在伯克看来,每个个体(人)都要牵涉到生命的活动之中,这些活动最终会带给他们两种态度:有罪性和认同感。他所举的例子是诗人的作品。一方面,写诗本身就像是纯化自我的过程;另一方面,它是自我更新的仪式。事实上,在自我的修辞所存在的方式方面,所有诗歌都具象征性。

每首诗始于“此”而终于“彼”。幸亏有了诗歌,诗人才有机会抒发出其胸中所关心的东西,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摒弃其有罪性,获得精神的幸福。换言之,诗人有机会从“死亡”转向“新生”。在此意义上,每首诗都是一次净化的机会,是对不合人意、丑恶和憎恨事物的象征性赎罪。^[17]

伯克叩问自己这篇或那篇文学作品的意义,追问作家们写作这首或那首诗歌的动机。他所想知道的是人类动机和象征方式的选择之间的关系(调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理想的生产(创作)必须不同于那个理想”。同样的情况适用于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稣),必须把他跟完全属灵的上帝^[18]区别开来。

在他重要的杰作《宗教修辞》(*Rhetoric of Religion*)一书中,伯克写道,神学的正式原则为整个象征系统带来光明。

诚然,他指出,语言的天才并不仅仅基于其依赖自然和精神次序的能力之上,而且还基于其否定二者的能力之上。的确,这种否定是一种道德原则^[19](禁止)。事实上,道德标准是依赖于语言的一种现象。“如果我们

[15] Kenneth Burke, *Counter-Statement*, 1931, p. 157.

[16] Id., *Attitudes towards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37), 1984, p. 329.

[17] William H. Rueckert, *Kenneth Burke and the Drama of Human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pp. 97 - 98. 也可参见 K. Burke, *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 Essays on Life, Literature and Metho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18] 上帝=耶和華。

[19] Kenneth Burke, *The Rhetoric of Religion*, op. cit., p. 187.

能够把语言从这个世界上消除,那么我们将不会再有任何发生效用的道德需求。”〔20〕在他看来,这正像有罪性的概念也是语言的产物,因为有罪性也是一种向法律“说不”的方式。〔21〕

在神学中,能够统一道德准则的原则,用伯克自己的话说,就是上帝一词。上帝这个词包含着人类行动所提供的一种价值判断(分类)。这种行动(人类的观念)把我们与符号联系起来,最终帮助我们依据文学想像对这些观念进行分类。这就表明,为什么人一开始谈话,他的言语就表达了其价值观。人一表达了价值观,我们立刻就参照我们的价值观等级。事实上,每个价值观等级因此都带有一个高级价值观,即上帝一词。

伯克以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美国民主派)和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智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诗歌来举例说明,两者都带有一种政治想像。因此,对但丁而言,上帝就是上帝!

三、哈罗德·布鲁姆和阐释性文学经典

如果伯克的任务是分析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那么哈罗德·布鲁姆的任务曾经是在本质上致力于确立文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他投身于对文学经典及其先驱之间所谓的倒转率(修正关系)的研究。

尽管布鲁姆对伯克特别敬重,认为他是美国最伟大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之一,但布鲁姆还是把伯克远远抛在了身后。他说,“否定是对曾受压抑之物的一种重视(弗洛伊德);是拿走压抑着的外壳,接受被压抑之物。”〔22〕

布鲁姆认为,在现代诗歌中,感觉是幻觉。对他而言,当代诗歌没有意义,只不过是他人诗歌拖延的产物。对布鲁姆而言,诗歌的独创性与独特性仍旧主要在于过去的成就,特别是罗马诗人和莎士比亚所取得的成就。布鲁姆认为,莎士比亚是文学上不可逾越高度的创立者。〔23〕

因为文学的高度已经达到并确立,因此,我们时代的诗人因生时太晚而不能在其创造性方面表现出独创性,他没有办法被焦虑所控制。在《影

〔20〕 Ibid., p. 295.

〔21〕 Id., *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For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1), 1973, p. 61.

〔22〕 Harold Bloom, *The Breaking of the Vessel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 11.

〔23〕 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94, p. 50. 在《莎士比亚:人的创造》(*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8)中,布鲁姆走得更远(第717页)。

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1973)一书中,布鲁姆阐述了一种文学理论,其依据是:文学经典是其与过去创作的文学著作相对峙的结果。

因此,从《奥秘教义与批评》(*Kabbalah and Criticism*, 1975)开始,布鲁姆成为文学中蕴含宗教内涵的支持者。“诗歌中的宗教想像会产生真实的存在(因为在他看来,诗歌并不拥有任何存在、任何统一或任何意义)。这一存在是信仰,一种许诺,依赖于我们所期望的事物,这是我们尚未见到的事物之存在的证据。”〔24〕

布鲁姆在他《器皿的破碎》(*The Breaking of the Vessels*, 1982)一书中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在本书中,他声明自己是不可知论者。这是因为他内在的侵越感,即由于受了正统教育,他成了诺斯替派的犹太人的这份罪行。〔25〕

在《毁灭神圣真理》(*Ruin the Sacred Truth*, 1989)一书中,布鲁姆为自己的观点作辩护。他使用了一些重要的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来自犹太教《圣经》及其所谓的作者,19世纪的语言学称之为“以耶和华作为上帝名称的作者”〔26〕。另外一个例子来自但丁和天主教神学,特别是但丁把比阿特丽斯作为其救赎的拟人化神话这一非凡的创造(比阿特丽斯位居非凡灵知的中心〔27〕),还有一个例子取自弥尔顿及他的新教神学。

在他最后的一部书《千禧之兆》(*Omens of Millennium*, 1996)中,布鲁姆向正统教理发出非难,比如犹太教、天主教、逊尼派伊斯兰教和伊朗伊斯兰教集团,认为这些教义压抑了被称为灵知〔28〕的西方宗教的想像因素。这里,布鲁姆谈的是在他看来与诗歌中的感觉、幻想密切相关的精神体验。〔29〕

布鲁姆承认,“每位诗人都比其他人更开始于反抗其必须面对的不可逃避的死亡意识,即便他是无意识的。”〔30〕

〔24〕 *Kabbalah and Criticism*, New York, Continuum, 1975, p. 122. 在《天才:一百位榜样创造性人物》(*Genius: A Mosaic of One Hundred Exemplary Creative Minds*, New York: Warner Books, 2002)中,布鲁姆利用犹太教神秘教义把本书组织起来献给文学作品天才。参见第 xi 页。

〔25〕 Id., *The Breaking of the Vessels*, op. cit., p. 43. 也可参见:“Lying against Time: Gnosis, Poetry, Criticism”, in Harold Bloom, *Agon: Towards a Theory of Revisio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26〕 *The Book of J*, New York, Vintage, 1991, p. 71.

〔27〕 Id., *Ruin the Sacred Truths*, op. cit., p. 47.

〔28〕 灵知是宗教神秘的最高知识。它是哲学折中主义,假装调节所有宗教,并解释其深层意义和使命。

〔29〕 H. Bloom: *Omens of Millennium: The Gnosis of Angels, Dreams and Resurrection*,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6, p. 227.

〔30〕 Id.,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op. cit., p. 10.

四、乔治·斯坦纳与语言的宗教现实

在他最近的《创作的语法》(*Grammars of Creation*, 2001)一书中,乔治·斯坦纳认可哈罗德·布鲁姆所作研究的重要性。然而,相较于布鲁姆赋予文学影响以最重要的地位,斯坦纳却只把它看做是次要的因素。对斯坦纳而言,重要的并非是与莎士比亚的文学之战,而是一种审美之战,尤其是基于神学基础之上的审美之战,“与天使的奋争是人类创造性的原型”^[31]——斯坦纳如是说。

斯坦纳也赞同希腊神话和悲剧。在他看来,希腊神话和悲剧与所谓的超越的维度^[32]关系很大。他还认为,莎士比亚避开了文学的本质问题。^[33]在其文学思想著述中,斯坦纳高度颂扬了宗教主题。

斯坦纳把文学视为赋予人们一个机会从而形成各个时代神学困境(尤其是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奥斯维辛的斩尽杀绝之后的那些困境)的一种活动。^[34]

斯坦纳总是忧心上帝的缺席,尤其是在他真正需要预设上帝存在的时候。他研究的主流可以在《悲剧的死亡》(*The Death of Tragedy*, 1961)一书中清晰地看到。在他看来,悲剧表述了卷入创造的神秘之中的人类的本质问题,“世上存在不公正的神秘、灾难的神秘,这些神秘超越了人类对其有罪性的理解。有些东西侵犯了我们的道德期望。”^[35]人类面对神灵时,其根本困境总是存在。在斯坦纳看来,悲剧隐含着英雄(主人公)和神性(上帝)对于苍天之下发生的世俗事情承担的共同责任。

在斯坦纳看来,悲剧是对神性与俗性之间关系的困境所作的一种抵制,“悲剧产生于污辱感,它是对生活状况的抵制,这种抵制本身包含无序的可能性(参见安提戈涅的叛逆精神)”^[36]。

在《通天塔》(*After Babel*, 1975)中分析语言和翻译时,斯坦纳谈到自

[31] George Steiner, *Grammars of Creation*, op. cit., p. 327.

[32] G. Steiner, *Les Antigones*, Paris: Gallimard, 1986.

[33] 相反地,对哈罗德·布鲁姆而言,莎士比亚是最重要的作家。参见 H. Bloom, *The Western Canon*, op. cit., p. 50. 亦见“Une lecture contre Shakespeare”, *Passions impunies*, Paris: Gallimard, 1997, p. 234.

[34] G. Steiner, “A Responson”, in Scott, Nathan A. and Ronald A. Sharp (Eds), *Reading George Steiner*,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80.

[35] G. Steiner, *la Mort de la tragédie*, Paris: Gallimard, 1993, p. 17.

[36] Ibid.